

20 世纪非汉文维吾尔史料和文献整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牛汝极

(新疆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 本文简要回顾了非汉文维吾尔史料和文献 20 世纪内在国内外整理和研究的基本情况, 并对今后的发展情况作了扼要展望。

关键词: 维吾尔; 回鹘; 史料; 突厥; 宗教

中图分类号: H215

文献标识码: A

史料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曾说:“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 才能使中国的历史, 在史料的总和中, 显出它的大势; 在史料的分析中, 显出它的细节; 在史料的升华中, 显出它的发展法则。”^[1] 可以说, 维吾尔历史资料与文献的收集、挖掘和整理的程度决定了维吾尔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就维吾尔族史料与文献整理研究而言, 在汉文史料的收集、整理、考释等方面利用、挖掘得较为充分, 其代表性的史料集成, 如: 冯家升等编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下册, 民族出版社 1958/1981 年)、陈高华编《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4 年)、陈高华编《元代维吾尔、哈刺鲁资料辑录》(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 年)、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刘美崧著《两唐书回纥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 年)、杨圣敏校注《突厥回纥史料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冯志文、吴平凡编《回鹘史编年》(新疆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等。而非汉文的维吾尔史料的整理、译释和研究工作却进行的很不够, 虽然有一些成果, 如: 冯家升等编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下册, 民族出版社 1958/1981 年)、郭平梁、刘戈著《回鹘史指南》(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牛汝极著《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等, 这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回顾 20 世纪国内外非汉文维吾尔史料和文献整理研究的成果, 为行文方便, 下面我们以文字种类为主线从突厥文、粟特文、摩尼文、回鹘文、婆罗米文、藏文、叙利亚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察哈台文等方面作一粗线条的介绍和总结, 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敬请指正。

1. 突厥文

19 世纪以来, 中外学者相继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敦煌、吐鲁番、中亚、西亚等地发现突厥文(又称突厥鲁尼文), 这种文字记录的语言是古代突厥语, 为古代突厥人、回纥人、黠戛斯人等共同使用。1893 年, 这种文字首次被丹麦学者 Vilhelm Thomsen^[2] 破译解读, 随之, 俄国学者 W.W.Radloff 解读译释了几个较重要的突厥文碑铭, 如:《阙特勤碑》、《敦欲谷碑》、《毗伽可汗碑》、《翁金碑》等。之后, A.von Le Coq^[3], W.Bang^[4], G.Clauson^[5], G.J.Ramstedt^[6], E.Tryjarski^[7], C.E.Malov^[8], H.N.Orkun^[9], T.Tekin^[10], S.G.Kliashtorniy^[11], René Giraud^[12], A.N. Bernshdam^[13], 韩儒林^[14]、岑仲勉^[15]、

耿世民^[16]、图尔逊·阿优甫、阿布都克优穆·霍加^[17]、芮传明^[18]、森安孝夫^[19]等。此外，冯家升对吐鲁番交河发现的突厥文崖刻题记，李经纬对苏吉碑，刘义棠、牛汝极和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对翁金碑，卡哈尔·巴拉提对铁尔浑碑，张铁山和买提热依木·沙依提对突厥文占卜书，杨富学对台斯碑等也发表过相关论文。目前已知属于或者涉及回鹘史的突厥文碑铭、文献主要有：《磨延啜碑》（希乃-乌苏碑，或色楞格碑）、《九姓回鹘可汗碑》（喀喇-巴勒喀孙碑，或保义可汗记功碑）、《苏吉碑》、《铁尔浑碑》（塔里亚特碑）、《塞维列碑》、《台斯碑》（牟羽可汗碑）、《占卜书》、《毗伽可汗碑》（默棘连可汗碑）、《雀林碑》、《阙利啜碑》（伊柯-库硕图碑）、医药类文书、法律类文书残片、军事类文书残片、宗教类文献残片等。

突厥文碑铭文献的年代集中于公元 7~11 世纪。作为史料，这批材料对漠北回纥、河西回鹘、西州回鹘史的研究价值极高。自突厥文破译以来的百年中，国内外回纥突厥文碑铭文献研究成绩较大者主要有：W.W.Radloff, Vilhelm Thomsen, G.J. Ramstedt, C. Malov, H. N. Orkun, T. Tekin, S. G. Kliashtorniy, 耿世民，森安孝夫等。

这里，特别值得介绍两本书：

芮传明著《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书中对突厥史地、事件等从突厥文碑铭的角度进行详细考证，其中不乏个人见解。书后附有 5 个碑铭的汉文译注：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敦欲谷碑、翁金碑、阙利啜碑。其汉文译文主要参考了 T. Tekin 和耿世民的译文后从新译释的，值得注意。

森安孝夫与 A. Ochir 合编《モンゴル（蒙古）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中央ユーラシア学研究会 1999 年 3 月，3+294+图板 86 页），这是 1996 年~1998 年间日本中央欧亚学会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联合调查蒙古高原突厥时期（6~8 世纪）、回纥时期（8~9 世纪）和蒙古时期（13~14 世纪）遗迹和碑铭的最新考察研究报告。参加者主要有：森安孝夫、吉田丰、林俊雄、片山章雄、松田孝一、杉山正明、A. Ochir、L. Bold、D. Bayar 等。书中有详尽的 3 年间的行程地图、活动记录、测试数据表、文字说明等，然后是对各调查遗址、碑铭的描述介绍，对碑文的转写、英文和日文翻译，词语注释和参考文献等。书后附百余幅图板详加描绘。书中所收与突厥、回纥有关的碑铭有：布古特碑、翁金碑、九姓回鹘可汗碑、阙特勤碑、台斯碑、塔里亚特碑、磨延啜碑、塞维列碑等。该成果意义重大，应予以特别关注。

此外，蔡鸿生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 1998 年）、吴玉贵著《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等著作对突厥文碑铭文献多加引述。

2. 粟特文

中国发现的粟特文主要出自吐鲁番和敦煌，大多为西方探险家所获，现分藏英、法、德、俄、瑞典、芬兰等国图书馆或博物馆中。粟特文记录的语言是粟特语，属一种中古东支伊朗语。粟特文最早由 F.W.K. Müller 解读。文献的年代多在公元 4~10 世纪。这批史料对研究回纥族源、回纥与粟特的早期关系等价值较高。先后对粟特文进行研究和介绍的学者主要有：W.B. Henning^[20]、R. Gauthiot^[21]、F.W.K. Müller^[22]、E. Benveniste^[23]、O. Hansen^[24]、J.P. Asmussen^[25]、W. Sundermann^[26]、D.N. MacKenzie^[27]、N. Sims-Williams^[28]、J. Hamilton^[29]、吉田丰^[30]、荣新江^[31]等。目前所知，粟特文文献的内容主要分为四个

方面:

摩尼教内容:《大力士经》、《祈祷忏悔文》、《穆护的谋杀》、《创世纪》、《譬喻故事》、《胡威达曼》、《赞美诗》、《约伯的故事》等。

佛教内容:《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摩诃般若波罗密经》、《佛说善恶因果经》、《吠舍檀多本生故事》、《长爪梵志请问经》、《劝解酒肉经》、《药师经》、《佛说时非时经》等。

景教内容:《新约圣经》、《新约福音书》、《圣乔治受难记》、《圣句集》、《景教徒书信》等。

官私文献、文书:《布古特碑》、一些法律文书、跋文和书信残片等。

值得一提的是, N.Sims-Williams 和 J.Hamilton 合作刊布的现藏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的粟特文集成之作《敦煌 9~10 世纪突厥化粟特文文献汇编》, 书中刊布了 8 件粟特文献的研究、47 幅图版, 其中包括一件汉文长卷《肃州太都状上》的图板, 这是一件研究河西回鹘极重要的文献。其中的粟特文献是我们观察 9~10 世纪时粟特人回鹘化的珍贵材料。此外, W.B.Henning 的《粟特语文献》(伦敦 1940 年)、吉田丰的《粟特语文献》(山口瑞丰编《敦煌胡语文献》, 东京 1985 年)和 W.Sundermann 的《粟特语摩尼教譬喻文献》(柏林吐鲁番文献丛刊, 卷 XV, 柏林 1985 年)等著作也非常重要。

十分遗憾的是, 至今我国没有专门研究粟特文的专家。

3. 摩尼文

摩尼文源自叙利亚文福音体, 是摩尼教的正式文字。本世纪初, 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发现了大批摩尼教文献, 收集的残片达数千片之多, 并发现了一个地下摩尼教图书馆。摩尼文文献多发现于吐鲁番的吐峪沟和敦煌千佛洞。摩尼文文献主要藏于德国柏林、英国伦敦和俄罗斯圣彼得堡。摩尼文文献的年代在 8~10 世纪之间, 使用的语言主要有中古伊朗语(如: 帕提亚语、钵罗婆语、中古波斯语)、回鹘语和粟特语几种情况。F.W.K.Müller 最早解读摩尼文并最早研究了几件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所获摩尼文文献^[32], 随后, E.Benveniste, W.B.Henning, A.von Le Coq, A.von Gabain, M.Boyce, C.Salemann, J.P.Asmussen, W.Sundermann, H.-J.Klimkeit 等都对摩尼文文献进行了研究。其中, M.Boyce 的《德国吐鲁番收藏品中摩尼文伊朗语写本目录》和《摩尼教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读本》; A.von Le Coq 的三卷本《高昌出土摩尼教突厥语文献》; W.Bang 和 A.von Gabain 的《突厥语吐鲁番文献》第 II、III、IX 卷; J.P.Asmussen 的《摩尼教文献: 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作品选》和《摩尼教徒忏悔词研究》(1965 年); W.Sundermann 的《中古伊朗语摩尼教文献》和《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摩尼教创世譬喻故事文献》; H.-J.Klimkeit 的《明教赞美诗与祈祷书: 中亚摩尼教伊朗语和突厥语礼拜文献》; 李经纬的《摩尼教徒忏悔词译释》(1982 年); 牛汝极的《摩尼文及摩尼文突厥语文献》(1989 年)等论著较重要, 为我们了解回鹘人的摩尼教信仰及其与中古伊朗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4. 回鹘文

回鹘文源自粟特文。回鹘文文献主要出自吐鲁番、敦煌、哈密、库车、莎车等地, 在

居庸关、赤峰、百灵庙、酒泉、和田、泉州、武威等地也有文献、碑铭或壁刻发现。回鹘文使用的时代在 9~14 世纪间。回鹘文文献是迄今所知保存数量较大的一类，但多藏欧洲各大图书馆内。在我国，回鹘文文献主要藏于吐鲁番文物局、新疆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敦煌研究院、甘肃博物馆等部门。旅顺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酒泉市博物馆、库车县文管所等也有少量回鹘文文献保存。根据内容可将回鹘文文献分为宗教类和非宗教类两类：

宗教类：

摩尼教文献：经典、赞美诗、祈愿文、忏悔文、寺院文书、故事、其他等。

佛教文献：经论、赞美诗、发愿文、寺院文书、忏悔词、功德记、故事等。

景教文献：教义经典、故事、墓碑铭文等。

道教：星占、符咒、易经译本等。

伊斯兰教：劝诫书、圣徒传记等。

非宗教类：

契约文书、书信、公文、历法、医药、传说故事。

回鹘文研究的先驱是德国的 J.Klaproth, 早在 9 世纪上半叶, 他就对流传到欧洲的我国明代编写的回鹘文《高昌译语》的抄本进行了研究, 并于 1820 年出版了《回鹘语言文字考》一书^[33]。另一位研究回鹘文的先驱是俄国的 W.W.Radloff, 19 世纪末期他就整理刊布了回鹘文本《福乐智慧》和《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以及金帐汗国时期用回鹘文写成的其它文书。随后, 他又刊布了《十方平安经》、《妙法莲花经普门品》、《金光明经》、《回鹘文文献汇编》等。

在回鹘文摩尼教文献整理研究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论著：F.W.K.Müller 的《两叶摩尼教赞美诗残片》（*Mahnmag Ein Doppelblatt aus einem manichaischen Hymnenbuch*, APAW, 1912）；A.von Le Coq 的《高昌突厥语摩尼教文献》（*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I、II、III, 1911~1922）；Willi Bang 曾与其学生冯加班（A.von Gabain）等一起刊布了六卷《突厥语吐鲁番文献》（*Türkische Turfan Texte*, I~VI），其中有《大型摩尼教赞美诗》和《牟羽可汗入教记》（牛汝极发表了汉文译本），他还发表了《回鹘文摩尼教有关风神的残卷》（1928）和《摩尼教赞美诗》（1925 年）；Peter Zieme 的《摩尼教突厥语文献》（柏林吐鲁番文献丛刊，卷 V，1975 年）、《回鹘王国摩尼教寺院回鹘文经济文书》（1975 年）；L.Clark 的《突厥语摩尼教菩提书研究》（1982 年）；耿世民的《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考古学报》1978 年第 4 期）；耿世民与 H.-J.Klimkeit 和 P.Laut 共同刊布了 1980 年在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文献《摩尼佛与王子的较量》（1987 年，另外，多鲁坤和斯拉菲尔发表了汉文译文）和《三王子的故事》（1989 年，另外，斯拉菲尔发表了维吾尔文本）；J.Hamilton 在其两卷本的《敦煌 9~10 世纪回鹘文文献汇编》（1986 年）中收有 5 件摩尼教文献（有牛汝极和杨富学的汉文译文），他还发表了《公元 988、989 和 1003 年的回鹘文摩尼教历书文献》（1993 年）；森安孝夫的《回鹘摩尼教史研究》（1991 年）；杨富学和牛汝极的《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释文的几处商榷》等。P.Zieme 现在正与 L.Clark 和 Aloïs van Tongerloo 教授合作整理研究已知全部古代回鹘语摩尼教文献，大约有 400 个残片，准备出版多卷本的突厥语摩尼教文献集成，将全部由 Brepols 出

版公司出版。Jens Wilkens 编辑了保存在德国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回鹘语摩尼教残片目录，这个目录是《德国东方写本目录》项目的一部分，作为 *Verzeichnis Orientalischer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VOHD) 系列之一由 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 出版。

在回鹘文佛教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论著：F.W.K.Müller 的《回鹘文献》(I、II、III)、《回鹘文考释》、《吐鲁番出土的两个庙柱铭文》；A.von Gabain 的《突厥语吐鲁番文献》(第 1~6、8~10 卷)、《玄奘传回鹘文译本》等；W.W.Radloff 与 C.Malov 共同刊不了回鹘文《金光明经》(《佛学丛刊》，卷 17 圣彼得堡，1913—1917)；G.Hazai 的《回鹘文〈金光明经〉残卷及傅大师的神歌》(与 P.Zieme, 1971 年)、《柏林吐鲁番文献中的佛教诗歌》(1971 年)；P. Zieme 的《瑜伽师地论和文殊师利赞》(与 G.Kara)、《吐鲁番与敦煌出土回鹘文头韵诗歌文献》(1991 年)、《回鹘文〈金光明经〉》(1996 年)、《回鹘文佛教头韵诗》(1985 年)等；Klaus Röhrborn 的《回鹘文超度亡灵的祷词》、《吐鲁番出土对照词汇文献残卷》、《回鹘文〈玄奘传〉研究》(第 7 卷、第 8 卷)；S.Tezcan 的《回鹘文〈玄奘传〉第十卷研究》和《回鹘文 *Insadi* 经研究》(BT.III,Berlin,1974)；L.Yu.Tugusheva 的《回鹘文〈玄奘传〉研究》(1971、1982 年)；Ingrid Warnke 的《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研究》；P.Laut 的《早期回鹘佛教及其文学遗产》(Wiesbaden 1986 年)、《古代突厥语写本之三：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胜金口和木头沟写本》(1998 年)；耿世民、H.-J.Klimkeit、P.Laut 的《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I、II, 1988 年)、《佛教预言故事：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 20~27 章》(1998 年)；庄垣内正弘的《回鹘语文献研究》(I, 1982 年、II, 1983 年)、《大英博物馆 Or • 8212 (109) 号回鹘文写本》(1974 年)、《大英博物馆 Or • 8212 (108) 号回鹘文写本》(1976 年)、《回鹘文文献〈阿含经〉拔萃》(1981 年)、《中村不折氏旧藏回鹘语文书断片之研究》(1979 年)、《古代维吾尔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之研究》(I, 1991、II, 1993、III, 1994)；百济康义的《回鹘文〈观无量寿经〉残片修订》(1979 年)、《回鹘文〈妙法莲花经玄赞〉1》(1983 年)、《回鹘文〈阿毗达磨顺正理论〉抄本》(1982 年)、《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片》(1984 年)、《入阿毗达磨论注释书考》(1980 年)、《瑞典民族学博物馆所藏回鹘文写本暂编目录》(1980 年)；小田寿典的《回鹘文八阳经〈大谷氏所藏残片〉追考》、《回鹘文本八阳经写本的系谱与宗教思想问题》(1978 年)、《龙谷大学图书馆藏回鹘文八阳经断片拾遗》(1983 年)；冯家升的《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1953 年)、《1959 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耿世民的《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1994 年)、《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1986 年)、《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1987 年)；李经纬的《哈密本〈弥勒三弥底经〉初探》(1982 年)、《佛教二十七贤圣回鹘译名考释》(1982 年)、《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三卷研究》(1983 年)、《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首品残卷研究》(1985 年)、《回鹘文〈金光明经〉序品译释》(1987 年)；斯拉菲尔、多鲁坤、阿不都克尤木的《弥勒会见记 I》(1988 年)；卡哈尔·巴拉提的《回鹘文〈玄奘传〉第三卷研究》(1992 年)、《回鹘文〈玄奘传〉第九卷研究》(1993 年)；张铁山的《北京图书馆藏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与王梅堂 1994 年)、《敦煌本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卷研究》(1996 年)；牛汝极的《一件敦煌回鹘文皈依佛教三宝愿文研究》(与 P.Zieme 1996 年)等。特别值得介绍一本由 J. Elverskog 完成并于新近出版的名为《回鹘佛教文献》(*Uygur Buddhist Literature, Silk Road Studies 1, Turnhout: Brepols, 1997, 154 pp., BEF1,700*)的新书。该书的导言交代了回鹘文佛教文献的发现历史和回鹘佛教徒的翻译活动；然后对回鹘佛教文献本身进行了描

述。如：三藏、本生、譬喻文献，大集经、注疏，坦特罗及其他佛教著作。在每件文献名下都有文献内容、来源、翻译、研究情况、版本及其他相关信息的介绍。书中收有比较完善的回鹘佛教文献研究题录索引等，是百年来难得的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的导论书。

回鹘文藏传佛教密宗文献是国内研究非常薄弱的领域，亟待加强。回鹘文藏传佛教文献多出自吐鲁番，而且有不少刻本文献。这类文献主要有以下一些：《吉祥轮律仪》、《胜军王问经》、《十方平安经》、《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转轮王曼陀罗》、《瑜伽师地论》、《无量寿宗要经》、《秘密集会坦特罗》等。由此可知藏传密宗佛教对高昌地区回鹘人的影响较大。

吐鲁番出土大部分基督教文献都出自吐鲁番北部的布拉依克废墟。德国第一次和第二次中亚探险队在这里发掘了一批残缺的写本，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叙利亚文的使用上看，其中大部分均为基督教文献。在吐鲁番绿洲的阿斯塔那、高昌故城和吐峪沟等地也出土了少量不同语言的基督教文献^[34]。还发现过《圣经》的回鹘语译本片断。在吐鲁番附近发现有10世纪左右的用叙利亚文和回鹘文拼写突厥语的景教经典残片。回鹘人在宋末元初时曾信奉过景教，且盛极于元初。在回鹘文景教文献整理研究方面，成果不多，主要有：F.K.Müller的《巫师的崇拜》（1908年，后有W.Bang、W.W.Radloff、C.Malov、李经纬等人的研究和译本）；P.Zieme的《吐鲁番突厥语景教文献》；A.von Le Coq的《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基督教和摩尼教写本》（1909年）；J.P.Asmussen的《伊斯兰教以前中亚粟特语和回鹘语基督教文献》（1982年）；N.Sims-Williams的《吐鲁番和敦煌文献所见粟特和突厥基督徒》（1992年）；J.Hamilton与牛汝极的《中国东部发现的两方回鹘文景教碑研究》（1994年）、《泉州出土回鹘文也里可温（景教）墓碑研究》（1995年）、《赤峰出土景教墓碑铭文机族属研究》（1996年）等。

回鹘文伊斯兰教文献保存下来的不多，主要有：维也纳本《福乐智慧》^[35]、《真理的入门》^[36]、《帖木耳世袭》、《圣徒传》（Täzkirä-i Awliyā）、《升天记》（Miraj Namā）、《幸福书》等。在莎车、和田曾发现与伊斯兰教和法律契约有关的回鹘文文书^[37]。

回鹘文道教文献还不多见，主要有易经译本、星占、符咒等内容，由A.von Gabain等刊布发表。

在非宗教文献中，世俗文书、契约文书所占的比重较大，约有400多件。其中，W.Radloff的《回鹘文文献集》（1928年）、L.Clark的《西域13—14世纪回鹘文世俗文献导论》（1975年）、J.Hamilton的《敦煌9~10世纪回鹘文文献汇编》（1986年）、山田信夫著（小田寿典、P.Zieme、梅村坦、森安孝夫合编）的三卷册《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1993年）、李经纬著《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1996年）和《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1996年）等著作是本世纪回鹘文世俗文书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回鹘文历法文献研究，主要有W.Bang & A.von Gabain的《突厥语吐鲁番文献》I（1929年）、A.von Gabain & G.R.Rachmati的《突厥语吐鲁番文献》VI（1934年）、G.R.Rachmati的《突厥语吐鲁番文献》VII（1936年）、L.Bazan的《古代突厥世界的纪年体系》（1991年）等。另外，有两件回鹘文医药文献由G.R.Rachmati研究刊布（1930、1932年）。

5.婆罗米文

婆罗米文源自阿拉美文，后有北支吐火罗婆罗米文（或称笈多斜体）、南支于阗婆罗

米文（或称笈多草体）等变体。在吐鲁番、库车、和田、敦煌、焉耆、巴楚等地发现了大量婆罗米文。吐火罗语文献多为译自梵文的佛教典籍，年代在 6~8 世纪间。吐火罗文回鹘语文献中有一些梵语-回鹘语双语词汇对照残卷。H.W.Bailey^[38]、F.W.Thomas^[39]、R.E.Emmerick^[40]、D.Hitch^[41] 等对此都曾有过研究。

有一些回鹘语或突厥语文献是用北支吐火罗婆罗米文写成。1904 年 H.Stöner 就发表一篇有关高昌出土的中亚梵语文献，文后附录刊布了一件 40 行婆罗米文回鹘语文献的一部分。后来，M.Lewizki（1936）、H.W.Bailey（1938）A.von Gabain（1941）等也对此进行了研究。目前，已知回鹘语北支婆罗米文文献不少，约有 79 件，其中 57 件是梵语-回鹘语双语的，14 件是回鹘语婆罗米文，7 件手写本带有婆罗米词汇，1 件写本夹写婆罗米语词。其年代在公元 8~12 世纪。文献大多保存在德国。D.Maue 将回鹘语婆罗米文文献分为四组：

- A、梵语-回鹘语双语文献；
- B、回鹘语婆罗米文文献；
- C、带有婆罗米词语的突厥语文献；
- D、夹杂婆罗米词语的回鹘语文献。

这方面的文献研究主要由德国的 D.Maue 完成，他曾发表了许多文章，但最有代表性的是他 1996 年出版的作为《古代突厥语写本系列之一》的《婆罗米文和藏文文献》。书中刊布的文献多为回鹘人于 9-11 世纪用婆罗米文和藏文拼写回鹘语的写本，鲜为人知，为我们了解回鹘西迁以后与吐火罗人和藏族的经济与文化联系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并为回鹘语言史的重构提供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书中共刊布了 79 件婆罗米文回鹘语文献和 5 件藏文回鹘语文献。这是一部特别值得参考的重要著作。A.von Gabain^[42]、P.Zieme^[43] 等也研究刊布了几件回鹘语婆罗米文文献。

南支于阗婆罗米文突厥语文献可以被分为三组^[44]：

- A、带有回鹘语专名（人名、地名、族名、官号等）的官方文书。
- B、在被断代为公元 925 年 3 月 9 日的“钢和泰藏卷”（925 年？），文中有回鹘语人名、官号、族称清单；另有《甘州可汗与于阗王书》、《于阗使臣上于阗王奏稿》、《于阗王尉迟徐拉与沙州大王曹元忠书》等。
- C、编号为伯希和 2893 号文献的突厥语词汇表。这个词汇表出现了有关弓箭术、马蓄、身体部位等方面的突厥语词语，随后是其于阗语的译文。

另可参见 G.Clauson^[45]、J.Hamilton^[46] 等人的研究成果。这类文献多由白雷研究刊布。

6.藏文

与回鹘史有关的藏文文献可分为三类：

- A、藏文藏语所记与回鹘史地有关的文献。如：F.W.Thomas 所著《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II（London 1951 年），其中有关于沙洲、和田、罗布泊、突厥、回鹘及米兰出土的大

量木简所记西域回鹘等内容。《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记述》(P.T.1283 号卷子)是一件与回鹘关系密切的重要文献,巴高、克洛松、聪果尔、韩百诗、李盖提、森安孝夫、王尧等都参与了对该文献的研究。

B、藏文回鹘语所记与回鹘文史有关的文献。如:《八阳神咒经》^[47]、《祈祷菩萨文》^[48]、《佛教教理问答》^[49]、若干残片(Mainz 编号: 58、127、194、196、329、619、637、712)^[50]等。回鹘人使用藏文,大概是唐末、五代之际,回鹘人与吐蕃人因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需要而受吐蕃文化的影响或回鹘人出于对吐蕃人了解的需要而使用吐蕃文。

C、藏文藏语-回鹘文回鹘语双语文献。如:藏语-回鹘语双语词汇对照残片等。

目前,藏文有关回鹘史料的整理研究作的得还很不够,在我国就更加薄弱,亟待加强。

7. 叙利亚文

在中亚七河流域、喀什、阿力麻里古城(在今霍城县)等地区景教教堂遗址中发掘出用叙利亚文写成景教碑大约10余方。由此,学者们推测,景教大约于公元6世纪时就由波斯和叙利亚传入新疆。中外学者普遍认为,回鹘人在宋末元初时曾信奉过景教,且盛极于元初。叙利亚文回鹘语文献多景教内容。自西安发现781年(唐建中二年)所立的汉文-叙利亚文双语《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来,中国东西南北均有叙利亚文碑铭文献出土,如:新疆的霍城、吐鲁番^[51]、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四子王旗、北京房山、福建泉州和江苏扬州等地。中国发现的叙利亚文碑名和文献的年代约在9—11世纪和13—14世纪间。

在阿力麻里古城(今伊犁霍城县)到目前为止发掘出叙利亚文景教徒刻石约有7件。这些刻石与中亚七河流域出土的约六百余件景教徒碑石非常相似^[52]。

吐鲁番出土大部分基督教文献都出自吐鲁番北部的布拉依克废墟。德国第一次和第二次中亚探险队在这里发掘了一批残卷,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叙利亚文的使用上看,其中大部分均为基督教文献。叙利亚文写本中使用的主要是粟特语和叙利亚语,但也有四五十件回鹘语残片,其中有的已被学者研究刊布^[53],以及其他语言书写的《诗篇》的段落。在吐鲁番绿洲的阿斯塔那、高昌故城和吐峪沟等地也出土了少量不同语言的基督教文献^[54]。在吐鲁番附近发现有10世纪左右的叙利亚文或叙利亚文拼写回鹘语的景教经典残片。中亚及远东元代以前的景教传播,尤其是突厥人的景教信仰情况,已由A.Mingana作了详细论述,他在文中还译释了一篇新发现的大约写成于公元680~1000年间的叙利亚文文献。这件文献提及突厥人只用叙利亚语阅读《圣经》,把《圣经》翻译成突厥语,文中还提及高昌亦都护汗王^[55]。

1934年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内蒙古百灵庙附近发现景教墓石。1935年日本学者江上波夫曾发现不少叙利亚文回鹘语景教墓志铭^[56]。1937年马丁(Desmond Martin)发现6块叙利亚文回鹘语景教徒墓志铭^[57]。

在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有几处景教遗址发现叙利亚文回鹘语铭文:(1)在敖伦苏木古城(俗称“赵王城”)内外,1973年曾发现叙利亚文回鹘语景教墓碑9块,文字多者存5行,均有十字架^[58]。还发现有9块刻叙利亚文景教徒墓顶石。其中一方为叙利亚文-汉文一回鹘文三语合璧石碑。其中另一方存13行叙利亚文回鹘语的石碑,虽断为两段,但保存

较好^[59]。(2) 木胡儿索卜尔嘎古城东北约 100 米的景教徒墓地上发现有约 30 件景教徒墓顶石, 其中多数带叙利亚文回鹘语铭文。此外, 在内蒙古还发现过一些带叙利亚文的墓石^[60]。(3) 比其格图好来陵园, 70 年代发现至少 5 件叙利亚文小方碑, 但未发现景教墓顶石。

在四子王旗附近的“王墓梁”耶律氏陵园 1973 年发现 17 块带有十字架和叙利亚文回鹘语的景教徒墓顶石^[61]。上述内蒙古地区共有约 70 件景教墓石, 其中约半数带有叙利亚文回鹘语铭文, 至今未被研究。

在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城子乡曾出土一方叙利亚文—回鹘文合璧景教徒瓷制白釉墓砖, 叙利亚文保存 2 行, 与房山十字寺出土的刻有十字架墓石上的两行叙利亚文完全一样, 意为“仰之, 信之”, 此句出自《圣经·旧约全书》的《诗篇》第 34 章第 6 节。下方存 8 行回鹘文^[62]。在内蒙古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铭文主要是回鹘、汪古人的遗迹。

福建泉州出土过大约 20 余方元代景教徒墓碑或石刻, 其中带叙利亚文的墓碑至少有 5 方^[63], 带有回鹘文的墓碑至少有 1 方^[64], 带有八思巴文的墓碑至少有 4 方^[65]。泉州发现的叙利亚文铭文应是回鹘人的遗物。

1981 年在扬州曾出土一方叙利亚文—汉文景教墓碑^[66]。该碑下段, 右侧有竖写的三行汉文, 左侧有 12 行叙利亚文, 其中第 1 和第 12 行为叙利亚文记叙利亚语, 第 2 至第 11 行(共 10 行)为叙利亚文写突厥语^[67]。

在房山十字寺遗址, 1923 年发现有景教徒 2 方砖刻, 现藏南京博物院, 其中一方刻有十字架配莲花座, 十字架上方左右各存一行叙利亚文^[68]。1925 年在北京午门城楼清朝内阁档案中发现叙利亚文景教赞美歌写本 8 叶^[69]。

在梵蒂冈秘密档案中曾发现几件 13~14 世纪回鹘式蒙古文、叙利亚文突厥语和波斯语文献。其中在聂斯托里大主教玛尔·雅巴拉哈三世于 1302 和 1304 年写给罗马教皇的两封书信中发现了四枚带有十字架的叙利亚文记突厥语的朱色方印, 其中的叙利亚文和所记突厥语与七河流域发现的景教铭文十分相似, 其前两句意为: “长生天气力里, 蒙哥可汗圣旨”^[70]。

8. 波斯文

波斯文文献中使用的语言主要是中古波斯语, 其中有: 巴列维语、帕提亚语和粟特语等。与回鹘史有关的波斯文文献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A、史地游记: 如:《史集》、《世界征服者史》、《世界境域志》、《巴布尔编年史》、《巴布尔实录》等均有汉文译本。

B、宗教文献: 吐鲁番出土中古波斯文摩尼教、景教文献残片, 主要保存在德国。

C、世俗文书: 吐鲁番、敦煌、和田曾发现一些波斯文书信、契约文书等。

总体上, 与回鹘有关的波斯文文献不太多, 这方面的研究, 学术界进行的还不充分, 我国犹甚, 必须迎头赶上。

9.阿拉伯文

在新疆发现的阿拉伯文文献，根据内容大致可分为：

A、世俗文书类

与回鹘有关的较早的阿拉伯文文书出自莎车郊外，文书年代均在回历 473~529 年/公元 1080~1135 年之间，属喀拉汗王朝时期。据罗斯（Denison Ross）报道，1911 年在莎车郊外的一个果园里发现一批阿拉伯文和回鹘文契约文书，后来被送交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手中，此人又交给了印度政府，并由当时的印度考古总监保存。罗斯介绍说，“我收藏有一套照片，一共 15 件文书残片，其中 7 件是阿拉伯文的，5 件是阿拉伯文突厥语的，3 件是回鹘文突厥语的。阿拉伯语文书上的签名都是阿拉伯文，只有一件文书证人的签名是用回鹘文……”^[71] 罗斯后来把这套照片存入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博物馆。后人的研究多据罗斯的照片进行的工作。^[72] 斯坦因在其《西域》第 3 卷中也有对莎车文书的报道，根据罗斯提供的线索，斯坦因在其第 3 次中亚考察期间对莎车文书的出土地点进行了实地考察。马继业还从和田获得属于喀喇汗朝时期的 4 件阿拉伯文（其中有两件分别标明回历 401 年/公元 1010~1011 年和回历 501 年/公元 1107 年）和 24 件回鹘文文书^[73]。法国学者伯希和（P. Pelliot）在 1906—1908 年的中亚考察期间也曾在莎车的同一地点发现了 3 件阿拉伯文书，后由于阿尔（Cl. Huart）刊布^[74]。后来克劳森（G. Clauson）和特肯（S. Tekin）都曾对这批莎车文书，尤其是其中的突厥语文书进行了研究，但克劳森没有来得及发表他的研究就于 1974 年 5 月 1 日去世了^[75]。1984 年艾达尔（M. Erdal）在克劳森和特肯的研究基础上刊布了 5 件突厥语文书（7 幅图版），其中，4 件是回鹘文，1 件是阿拉伯文^[76]。1998 年李经纬先生根据艾达尔的研究将其中 4 件回鹘文文书译释为汉文^[77]。1986 年葛容克（Monika Gronke）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刊布了 5 件莎车阿拉伯语文书^[78]。这几件莎车阿拉伯语文书不仅具有回鹘语言学价值，而且对回鹘历史学和法学方面研究也提供了珍贵的学术信息。

B、史地游记类。如：《突厥语辞典》（有土耳其文、德文、俄文、乌兹别克文、维吾尔文、英文等文种译本）、《马卫集论中国、突厥与印度》（有米诺尔斯基的译本）、《塔米姆·本·巴赫尔使回鹘行记》（有米诺尔斯基的译本）、《阿卜·杜拉夫的突厥斯坦、中国、印度》、《道里邦国志》（A 本有汉文译本）、《苏拉赫辞典补编》（有华涛的汉文译本）等。

C、伊斯兰教类。如：《福乐智慧》（有土耳其文、德文、英文、俄文、汉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等）、《真理的入门》（土耳其文、汉文、维吾尔文译本）、《古兰经》等。

10.察合台文

自 15 世纪初至 20 世纪初的 5 百多年里，西域使用一种由阿拉伯文改造而成的文字，人们称之为察合台文。因时间跨度大，距今时间近，这种文字的文献保存得就相对多一些。察合台文主要文献已有学者论及，此不赘言^[79]。

瑞典的维吾尔语专家古斯塔夫·拉凯特（G. Raquette）曾在喀什和莎车当医生，后当传教士。他曾在新疆获得大批手稿文献，多为察合台文，后来他把这些文献全部捐献给隆德大学图书馆。他曾整理刊布了流传于维吾尔民间的《塔伊尔和佐合拉》故事及几件历史文献。他的学生古纳尔·雅林（Jarring）于 1929~1930 年到喀什调查维吾尔语情况，积

极收集写本并将之运至隆德大学图书馆。他个人收集了 115 件写本，其中有 72 件（59 件属近代维吾尔语，又称察合台语手稿，8 件波斯手稿，5 件阿拉伯语手稿），于 1931 年被隆德大学图书馆购买。隆德大学为这次收获设立了专门机构——“雅林收集品中心”。目前，这个中心已有文献 486 大卷，每一卷又由若干文本组成，其总数已近 900 种，绝大多数为察合台语文献。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里也收藏有察合台语文献搜集品，虽然该目录并未说明这些写本的由来，而且其中的一些写有“自塔什干巡礼到麦加”之类的语句，但可以肯定，这些写本是雅林通过传教团从新疆携出的。瑞典的维吾尔文献研究主要是古纳尔·雅林进行的近现代维吾尔语或称察合台语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如《维吾尔语资料汇编》（1~4 卷，1946~1951 年，收入了喀什、莎车、皮山、库车、和阗等地的近代维吾尔民间创作及民族人类学材料）、《中亚的谎言故事》（1972~1973）、《突厥文献导言》（1976）、《喀什噶尔文献》2 卷（1980~1982）、《几则维吾尔对话体文学文献考释》（1981）、《无盗之城和食物与咽喉之争——四件近代维吾尔文献译释》（1989）、《中亚的文化冲突——伊斯兰视野中的汉族戏剧》（1991）、《服饰：从头到脚——有关服装的维吾尔文手稿》（1992）、《磨恩藏维吾尔语民歌谚语集》（1985）、《苦行僧和行乞者》（1987）、《新疆维吾尔人中的兴奋剂》（1996）、《20 世纪初中亚的农业与园艺业》（1998）等。美国学者 Janos Eckmann 所著《察合台语手册》（1966）和原苏联学者谢尔巴克的《古代乌兹别克语语法》是察合台文献研究极为重要的工具书。荷兰的 H.E.Boeschoten 与 M.Vandamme 长期合作研究伦敦和圣彼得堡收藏的察合台文写本拉布胡兹的《圣人传》（Qisasu l-Anbiya），发表了系列论文，他们与 S.Tezcan 合作新近出版了两大卷的拉布胡兹的《圣人传》（出版地：Leiden: Brill），其中第一卷是文献原文，其原文是以大英图书馆和圣彼得堡所藏察合台原本为基础的，书前附有导言，书后附有索引和词汇表；第二卷是与 J.O'Kane 合作完成的英文译本。在察合台文献研究方面，日本主要有间野英二、滨田正美、堀直等学者。间野英二（Mano,Eiji）主要研究中亚帖木儿帝国史、《拉施德史》，同时研究《巴布尔回忆录》。滨田正美（Hamada,Masami）主要研究叶尔羌汗国史，同时研究一些察合台文献。堀直（Hori,Suhao）主要研究天山南部近现代史，通察合台文及其文献并研究过《伊米德史》。江实（Minoru,Goh）主要研究《五体清文鉴》。

哈密提·铁木耳曾与阿不都若夫合著《察合台语》（喀什维文出版社，1987 年）和《两种语言之辨》（民族出版社，1988）。哈密提与安尼瓦尔·巴依图尔合作整理译释了察合台文献《乐师传》。哈密提整理出版了维吾尔文《巴布尔传》。最近，由王治来根据萨里耶 1958 年在塔什干出版的俄文本翻译为汉文《巴布尔回忆录》（商务印书馆 1997 年）。安瓦尔·巴依图尔整理翻译了察合台文献《毛拉穆萨诗选》、《伊米德史》、《安宁史》、《和卓传》等。陈宗振首次研究刊布了现藏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成书于清光绪六年（1880 年）孙寿昶所编汉维对照词汇集《汉回合璧》（见《民族语文》1989 年第 5 期）。依斯拉菲尔还与人合作整理出版了察合台文献《阿不都热依木纳扎尔诗集》（民族出版社，1985 年）。阿布都若夫·波拉提出版了《察哈台文及其主要特点》（见《民族语文》1990 年第 4 期），他的论文集《察哈台维吾尔语研究论文集》，书中收入了有关察哈台文及其文献和特点的论文 22 篇。

20 世纪 60 年代，当时新疆民族研究所宗教研究室的同志曾到南疆各地收集到 500 余件察合台文契约文书，80 年代开始对此进行翻译整理，其中的汉文译文由王守礼和李进新编辑并于 1994 年内部出版《新疆维吾尔族契约文书资料选编》书中共收 314 件文书，其跨度在 1778 年至 1949 年，史料价值极高。目前，关于察合台文献的整理和刊布工作仅仅是开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籍整理办公室、中国

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北京图书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新疆社科院历史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瑞典隆德大学图书馆、法国国立图书馆、法兰西学院图书馆、英国皇家图书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等单位都收藏有大量察合台文文献。新疆古籍办曾约请了许多察合台文专家整理并出版了一些重要的察合台文献。如：《伊米德史》、《成吉思汗传》、《布格拉汗列王传》、《先知传》、《赛伊德汗国历史》、《翟力里诗集》、《和卓传》、《古代维吾尔百工要领》、《拜赫拉木固尔》、《佐赫拉的果树园》、《依斯坎迪尔》、《纳瓦依的五部长诗》、《众心所爱》、《鹦鹉传》、《麦吉麦图里·艾贺卡木》等。最近，新疆维吾尔古典文学研究会组织专家整理并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维吾尔古典文学系列丛书主要都是察合台文献，其中如：《巴亚孜》（买买提明·玉素甫等整理）、《艾尔西诗集》（买买提吐尔逊·巴吾东整理）、《诺拜提诗集》（买买提吐尔逊·巴吾东整理）、《爱苦相依》（依斯拉菲尔等整理）、《买合祖尼诗集》、《鸟语》（阿布里米提·艾海提等整理）、《帕尔哈提与西林》（买买提吐尔逊·巴吾东整理）、《买西胡里诗集》（买买提明·玉素甫整理）、《坎兰黛尔诗集》（依斯拉菲尔·玉素甫整理）、《纳克斯诗集》（买买提吐尔迪·米尔孜艾合买提整理）、《尼扎勒抒情诗集》（买买提吐尔逊·巴吾东整理）、《赛迪依斯坎迪尔》（阿不都克尤木·霍加整理）、《拜赫拉木与迪拉热木》等。维吾尔文古典文学丛刊《源泉》（Bulaq）自 50 年代至今已发表了许多察合台语文献，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除以上文种，西夏文、巴思八文、回鹘式蒙文中也有涉及回鹘史料，但数量不多。

回顾这一百年来非汉文维吾尔史料、文献整理研究的成果，其中的利弊得失应该借鉴，经验教训需要总结，这对 21 世纪我国维吾尔史学研究的快速发展可以提供有益的参考。

首先，随着古代写本的发现、研究和刊布，大量珍贵的第一手古代维吾尔史料得见天日。重视借鉴国内外非汉文维吾尔史料、文献研究成果，使得我国维吾尔史学研究开始摆脱仅参考汉文史料从事研究的局面，这在 20 世纪最后 20 年里显得尤为突出。无论是漠北回纥、河西回鹘、西州回鹘，还是喀喇汗王朝、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等断代史的研究中都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利用新发现的多文种史料进行深度研究的论著。

其次，由于我国回鹘文、察合台文研究队伍的成熟和壮大，大量回鹘文、察合台文文献的研究刊布，同时，利用外文借鉴国外的回鹘文研究成果也日趋便利，使维吾尔史学研究得以利用参考成为可能，这为维吾尔史学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回鹘文和察合台文文献之多，远远超出包括汉文在内的其它各文种文献。

第三、在我国，突厥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的研究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些文种文献的释读、整理、研究将扩大维吾尔史学研究的领域，为全面、客观认识不同历史时期维吾尔族的情况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

第四、从总体情况看，国外对维吾尔文献的研究，历史长，文种全，成果多，尤其是在德国和日本。而我国的研究主要是从最近这 20 年开始的，有些文种，如：粟特文、婆罗米文、中古波斯文、摩尼文等文种还缺乏研究人员。一方面，我们急需借鉴参考并翻译出版国外在这方面有影响的成果，另一方面，从长远考虑，我们也需要培养若干这方面的中青年学者以便能正确独立识读文献。

第五、学术界目前有一种现象，历史学家常常因条件限制而对民族文字史料和文献注意不够，许多珍贵文献未被利用，十分可惜；另一方面，民族语文学家因对史学研究缺乏了解和积累，往往是仅刊布文献而未能结合历史资料对文献的价值深入研究。为改变这种

状况,今后需要语文学家与历史学家的通力合作。同时,一方面,要求从事维吾尔历史的学者至少掌握一两种相关古文字并能够识读,国外一些维吾尔史学家往往是某种古文字文献的大师;另一方面,要求维吾尔语文学家多学习掌握一些历史知识,反过来,这对古文献的理解也是有益的。历史与语言不分家是学术界一贯的倡导。

第六、着眼 21 世纪,为深化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有许多重大课题摆在我们面前:1、在分别编译、整理、出版各文种维吾尔史料、文献(如:回鹘文佛教文献集成、回鹘文世俗文书集成、突厥文回鹘碑铭文献集成、叙利亚文景教碑铭集成、摩尼文粟特文摩尼教文献集成、婆罗米文藏文回鹘语文献集成、察合台文维吾尔史料选编、波斯文阿拉伯文维吾尔史料选编)的基础上,编译出版维吾尔史料文献丛书(维吾尔宗教史料文献、维吾尔社会经济史料文献、维吾尔伊斯兰教史料文献、维吾尔法制史料文献、维吾尔政治史料文献、维吾尔文化科技史料文献等);2、整理编译非汉文维吾尔断代史料,打破文种的界限,以断代史为主线汇集各文种维吾尔史料(漠北回纥史料、西州回鹘史料、河西回鹘史料、喀喇汗朝史料、察合台汗国史料、叶尔羌汗国史料等),为深化维吾尔断代史研究提供重要依据;3、维吾尔文化史、维吾尔经济史、维吾尔政治史、维吾尔与其他民族关系史、维吾尔语言史、维吾尔文学艺术史、维吾尔法制史、维吾尔科技医药史等专门史将成为 21 世纪的重点研究领域,因而,与这些领域相关的非汉文维吾尔史料的编译整理就显得特别迫切。

中亚史、突厥史和回鹘史研究的一代伟人巴尔托里德曾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名著,他的伟大和不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对各种文字史料的关注、整理、利用方面倾注心血,不予余力。著名维吾尔史学家冯家升先生多有建树,他也是回鹘文大师,开我国回鹘文和突厥文研究之先河。展望 21 世纪,我们深信会有更多的巴尔托里德、冯家升式的学者及其论著的不断涌现。青出于蓝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参考文献

- [1] 翦伯赞.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A].史料与史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7.
- [2] Vilhelm Thomsen. Ein Blatt in türkischer "Runen"schrift aus Turfan.SPAW 1910: 296-306.
- [3] A. von Le Coq, Köktürkisches aus Turfan. Manuskriptfragmente in köktürkischen "Runen"aus Toyoq und Idikut-Schähri. SPAW1909: 1047 - 1061.
- [4] W.Bang,Zu den köktürkischen Inschriften und den türkischen Turfan-Fragmenten. Wiener Zw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23, pp.415-419.
- [5] G. Clauson, The Ongin Inscrip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57-3/4,pp.175-192.
G. Clauson & E.Tryjarski, The Inscription at Ilhe Khushotu. Ro 34-1,1971, pp.7-33, +6pls..
- [6] G.J.Ramstedt, Zwei uigursche Runeninschriften in der Nord-Mongolei.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30-3, 1913, 63p.,+3pls.
- [7] E.Tryjarski, On the Archaeological Traces of Old Turks in Mongolia. East and West , 1971,N.S.21-1/2,pp.121-135,+some pls.
----- Some Remarks on the Monument of the Orkhon Turks. In: Türk Kültürü VI Kitabı, Istanbul 1972,pp.35-43,418-422.
----- Die alttürkischen Runen-Insriptionen in den Arbeiten der letzten Jahre Befunde und kritische Übersicht.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8, 1981,pp.339-352.
- [8] C.E.Malov, Pamyatniki drevnetyurkskoy pis'mennosti, Moskva 1951.

- Yeniseyskaya pis'mennost' tyurkov, Moskva 1952.
- Yazık zoltıxuygurov, Alma-Ata 1957.
- [9] H.N.Orkun, Eski Türk Yazıtları, İstanbul, I: 1936; II: 1938; III: 1940; IV: 1941.
- [10] T.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Bloomington 1968.
- The Tariat(Terkhin) Inscriptio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37-1/3, 1983, pp. 43-68.
- Nine Notes on the Tes Inscriptio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42-1, 1988, pp.111 -118.
- [11] S.G.Kliashtorniy, Une inscription inédite turque et sogdienne. La Stèle de Sevrey (Gobi méridional). Journal Asiatique 259-1/2, pp.11-20,+3pls.
- [12] René Giraud, L'Empire des Turcs Célestes les Règnes d'Elterich Qapghan et Bilgä(680-734),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s Turcs d'Asie Centrale, Paris 1960.
- [13] A·N·Bernshdam, 杨纳译.6至8世纪鄂尔浑叶尼塞突厥社会经济制度(东突厥汗国和黠戛斯)[M].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 [14] V.汤姆森, 韩儒林译.蒙古古突厥文[J].《禹贡》第6卷第7期, 1936.12.
韩儒林.读阙特勤碑札记[J].《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6卷第6期, 1935.11.
韩儒林.读毗伽可汗碑札记[J].《禹贡》第6卷第6期.
- [15] 岑仲勉.跋突厥文阙特勤碑[J].《辅仁学志》第6卷第1-2合期, 1937.6.
岑仲勉据英文改译韩儒林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敦欲谷碑, 见《突厥集史》.中华书局, 1958.
- [16] 耿世民.回纥突厥文碑铭译文[A].林干、高自厚.回纥史[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4: 374 - 408.
- [17] Abuduqeyyum Hoja, Tursun Ayup, Israpil Yusup: Qedimqi Uyghur Yazma Yadikarlıqliridin Tallanma, Xinjiang Helq Nexriyati 1983.
- [18] 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19] 森安孝夫·オチル:《モンゴル国现存遗迹・碑文調査研究报告》, 中央ユーラシア学研究会, 1999.3.
- [20] W.B.Henning, Sogdica, London 1940.
- [21] R.Gauthiot, Une Version Sogdienne du Vessantara Jataka, Journal Asiatique, 1012, 163-193; 429-510.
- [22] F.W.K.Müller, Reste einer soghdischen Übersetzung des Padmacinta-manidharanisutra, SPAW, 1926, 411-411.
- [23] E. Benveniste, Testes sogdiens. Edites, traduits et commentes. Paris, 1940.
- [24] O.Hansen, Die Buddhistische Literature dee sogdien,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Iranistik II, 1, 1968, 83-90.
- Berliner Sghdische Texte II, Geistes und Sozialwiss., KI., 1954, Nr.15.
- [25] J.P.Asmussen, Sogidan and Uighur-Turkish Christian Literature in Central Asia before the Real Rise of Islam: A Survey, in: Indological and Buddhist Studies. Volume in Honour of Professor J.W.de Jong in his Sixtieth Birthday. Camberra 1982, 11-29.
- [26] W.Sundermann, Mittelpersische und Parthische Kosmogonische und Parabeltexte dr Manichaer, Berliner Turfantexte IV, 1973.
- Mitteliranischen Manichaesche Texte Kirchengeschelichen Inhalts, Berliner Turfantexte XI, 1981.

- The Manichaean Hymn Cycles Huyadagman and Angad Rosnan in Parthian and Sogdian. London 1990.
- [27] D.N.MacKenzie, The Buddhist Sogdian Texts of the British Library, Leiden 1976.
- [28] N.Sims-Williams, The Christian Sogdian Manuscript C2, Berliner Turfantexts XII, Berlin 1985.
- Sogdian Manuscript Collections: A Brief Report, Journal Asiatique, CCLXIX, 1981, 31-33.
- [29] N.Sims-Williams & J.Hamilton, Documents Turco-Sogdiens du IXe - 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London 1990.
- [30] 吉田丰. 《シグド语文献》, 山口瑞凤编《敦煌胡语文献》, 东京: 1985: 186-204.
- [31] 荣新江.敦煌吐鲁番出土中古伊朗与文献研究概述 [A].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 [C].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57-71.
- [32] F.W.K. Müller, Handschriften-Reste in Estrangelo-Schrift aus Turfan, Chinesisch-Turkistan, I, APAW, 1904, 348-352; II, APAW, 1904, Abh. 2, 1-117.
- Ein Hermas-Stelle in Manichaischer Version, SPAW, 1905, 1077-1083.
- Ein Doppelblatt aus einem Manichaischen Hymnenvuch (Mahnamf), APAW, 1912, 40p.+2pls.
- [33] J.Klaproth, Abhandlung über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Uiguren, Paris 1820, Reprinted by W.Scharlipp, Hamburg 1985.
- [34] Nicholas Sims-Williams, Sogdian and Turkish Christians in the Turfan and Tun-huang Manuscripts, in: 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 Encounter of Civilizations on the Silk Route, ed. by Alfredo Cadonna, Florencia 1992, pp.43 ~ 61.
- [35] A.Vamberg. 《回鹘文和<福乐智慧>》(1870 年) [M].此后, 拉德洛夫、阿拉特、伊万诺夫、丹阔夫、凯里莫夫、耿世民、郝关中等都对此进行了译释研究.
- [36] N.阿西木.《12 世纪回鹘文文献考》(1906) [M].此后, 拉德洛夫、阔普汝律、阿拉特、魏萃一等也对此进行了研究.
- [37] Vladimir Minorsky, "Some Early Documents in Person- I",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2, 181-94.
- Sinasi Tekin, "Bilinen en Esli Islami Türkçe metinler: Uygur Harflerile Yazılmış Karahanlılar Devrine ait Tarla Satis Senetleri", Selçuklu Araştırmaları Dergisi, IV , 1975, 157-86;
- "A Qarahanid Document of A.D. 1121(A.H.515) from Yarkand", in Eucharisteion: Essays Presented to Omeljan Pritsak,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III-IV, 1979-80, 2: 868-83);
- 林梅村.喀喇汗王朝文献真迹在莎车的发现及其对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的意义 [A].西域文明: 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 [M].东方出版社, 1995: 473-490.
- Marcel Erdal, "The Turkish Yarkand Documents", BSOAS, XLVII, 2, 1984, 260- 301.
- Monika Gronke, "The Arabic Yarkand Documents", BSOAS, XLIX, 3, 1986, 454-507.
- 牛汝极.莎车喀喇汗朝阿拉伯语法律文书与‘福乐智慧学’研究 [J].西域研究, 1999.3.
- [38] H.W.Bailey, Languages of the Saka: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IV. Band Iranistik, I. Abschnitt Linguistik. Leiden-Köln 1958, 131-154.
- Khotanese texts I- VI, Cambridge 1945-1967
- A Khotanese text concerning Turks in Khantsou. Asia Major N. 1949-1950, s. 1, 28-52.
- [39] F.W.Thomas, Brahmi script in Central Asian Sanskrit manuscripts: Asiatica. Festschrift Friedrich Wekker. Leipzig 1954. 667-700.
- Die Erforschung des Tocharischen (1960-1984). Stuttgart 1985.

- [40] R.E.Emmerick,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 Studia philologica Buddhica. Occasional I. Leiden 1981, 185-209.
- Buddhism in Central Asia: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Vol 2, ed. M. Eliade, New York 1987, 400-404.
- The transition from Old to Late Khotanese: Transition periods in Iranian history. Actes du symposium de Firourg-en-Brigau (22-24) Mai 1985, Studia Iranica 5, 1987, 33-42.
- Khotanese and Thumshuqese: Compendium Linguarum Iranicarum. Ed. R. Schmitt, Wiesbaden 1989, 204-229.
- [41] D. Hitch, Central Asian Brahmi Paleography: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Tocharian, Khotanese and Old Turkic Gupta scripts. Alberta 1981 (unpublished).
- Thumshuqes and Turkic Brahmi script.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11, 1987, 249 -252.
- [42] A. von Gabain, Türkische Turfan Texte VIII, Texte in Brahmi-schrift. Berlin 1952.
- [43] P. Zieme, Zur Verwendung der Brahmi-schrift bei den Uighur.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II, 1984.
- [44] E. Hovdhaugen, Turkish words in Khotanese texts. A linguistic analysis. Norsk Tidsskrift for Sprogvidenskap 24. 1971, 163-209.
- [45] G. Clauson, The Turkish-Khotanese Vocabulary reedited: Zeki Velidi Togan'ın armaghanı. İslam Tetkikleri Enstitüsü Dergisi. 5. 1973, 37-45.
- [46] J. Hamilton, Nasales instables en turc khotanais du Xe siècle. BSOAS, 40. 1977, 508-521.
- [47] A. von Gabain & G. R. Rachmati, Türkische Turfan Texte VI, 1936.
- [48] F. W. K. Müller, Uigurica, AKPAW, Berlin 1908, p. 17.
- [49] 伯希和 (1921 年)、毛埃 (1984 年)、森安孝夫 (1985 年) 等都曾参与研究。
- [50] D. Maue,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I: Dokumente in Brahmi und Tibetischer Schrift. Stuttgart 1996, p. 210-222.
- [51] 德国第三次中亚探险 (1905 ~ 1907 年) 曾在吐鲁番获得过几件叙利亚文突厥语文献。其中一件编号为 T III Kurutka 1857 的正背两面为一景教文献, 曾为德国回鹘文专家 Peter Zieme 刊布: Ein Hochzeitssegen Uigurischer Christen, Scholia Beiträge zur Turkologie und Zentralasienkunde, A. Von Gabain zum 80. Geburtstag am 4. Juli 1981, dargebracht von Kollegen, Freunden und Schülern,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PP. 221-234. 该文献正背两面存 36 行, 首尾残缺。
- [52] D. Chwolson, Syrische Grabinschriften aus Semirjetschie, Memoires de l'Academie Imperiale des Sciences de St-Petersbourg, VIIe Serie, t. X X X IV, № 4, St.-Petersbourg 1886.
- , Syrisch-Nestorianische Grabinschriften aus Semirjetschie. Nebst einer Beilage: «Über das türkische Sprachmaterial dieser Grabinschriften» Vom Akad. W. Radloff, Mem. Ac. Imp. Sc. de St.-Petersb., t. X X X VII, № 8, St.-Petersbourg 1890; Neue Folge, St.-Petersbourg 1897. D. Chwolson, Syrische Grabinschriften aus Semirjetschie, Memoires de l'Academie Imperiale des Sciences de St-Petersbourg, VII e Serie, t. X X X IV, № 4, St.-Petersbourg 1886. -----, Syrisch-Nestorianische Grabinschriften aus Semirjetschie. Nebst einer Beilage: «Über das türkische Sprachmaterial dieser Grabinschriften» Vom Akad. W. Radloff, Mem. Ac. Imp. Sc. de St.-Petersb., t. X X X VII, № 8, St.-Petersbourg 1890; Neue Folge, St.-Petersbourg 1897.
- [53] Peter Zieme, Zu den nestorianisch-türkischen Turfantexten, in Sprache,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r altaischen Völker (ed. G. Hazai and P. Zieme), Berlin, PP. 661-668, 1974.

- Zwei Ergänzungen Zu der christlich-türkischen Handschrift T II B1, 《Aof》5, PP.271-272, 1977.
- Materialien Zum uigurischen Onomasticon I - II, Türk Dili Araştırma Yıllığı-Belleten, 1977, PP.71-84; 1978-1979, PP.81-94.
- Ein Hochzeitssegen uigurischer Christen, in Scholia, Beiträge zur Turkologie und Zentralasienkunde A. Von Gabain..., Wiesbaden, PP.221-232, 1981.
- J.P. Asmussen, "The Sogdian and Uighur-Turkish Christian Literature in Central Asia before the Real Rise of Islam. A Survey", in Indological and Buddhist studies ... in Honour of professor L.J.W. de Jong..., ed. A. Hercus et al., Canberra, 1982, PP.11-29.
- W. Hage, "Das Christentum in der Turfan-Oase", in Synkretismus in den Religionen Zentralasiens, ed. W. Heissig and H.J. Klimkeit, Wiesbaden, 1987, PP.46-57.
- O. Hansen, "Die christliche Literature der Sogdier", in Ho I / IV, 2/1, PP.91-99.
- James Hamilton, Le Texte Turc en Caracteres Syriaques du Grand Sceau Cruciforme de Mar Yahballaha III, Journal Asiatique, 1972, PP.155-170
- F.W.K. Müller, Uigurica I, APAW, 1908, Nr.2, PP.3-10.
- [54] Nicholas Sims-Williams, Sogdian and Turkish Christians in the Turfan and Tun-huang Manuscripts, in: 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 Encounter of Civilizations on the Silk Route, ed. by Alfredo Cadonna, Florencia 1992, pp.43 ~ 61.
- [55] D.D.A. Mingana, The Early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Far East: A New Document, in: Bulletin of John Rylands Library Manchester, Vol.9, No.2, July 1925, pp.297 ~ 371.
- [56] 佐伯好郎(Yoshiro Saeki): “内蒙百灵庙附近に于ける景教の遺迹に就いて”, 《东方学报》(Toho Gakuho), vol.9, 1939, Tokyo, PP.49-89.
- 参见盖山林. 元代汪古部地区的景教遗迹与景教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A]. 黄盛璋. 《亚洲文明》第一集 [M].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2, 第 120 - 129 页及所附图版.
- [57] 朱谦之. 中国景教 [M]. 东方出版社, 1993: 174.
- [58] 盖山林. 阴山汪古 [M].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1: 270 - 271.
- [59] 同上, 第 271 - 273 页.
- [60] 同上, 第 278 - 281 页.
- [61] 同上, 第 276 - 278 页.
- [62] 参见 James Hamilton et Niu Ruji, 《Deux Inscriptions Funeraires Turques Nestoriennes de la Chine Orientale》, Journal Asiatique, No.1, 1994, P.159. 另见 J. Hamilton, 牛汝极. 赤峰出土景教墓砖铭文及族属研究 [J]. 民族研究, 1996. (3): 78 - 83.
- [63] 吴文良. 泉州宗教石刻 [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7, 景教图版.
- 朱谦之. 中国景教 [M]. 东方出版社, 1993, 图版 3、7、6、9、10.
- 罗香林. 唐元二代之景教 [M]. 香港中国学社出版, 1966: 182-186.
- 牛汝极. 泉州叙利亚-回鹘双与景教碑再考释 [J]. 民族语文, 1999. (3): 33-34 页及封三图板.
- [64] J. Hamilton, 牛汝极. 赤峰出土景教墓砖铭文及族属研究 [J]. 民族研究, 1996. (3): 78-83.
- [65] 照那斯图. 元代景教徒墓志碑八思巴字考释 [J]. 海交史研究, 1994. (2): 119-124.
- [66] 王勤金. 元延四年也里世八墓碑考释 [J]. 考古, 1989. (6): 553. 朱江只报道该碑出土于 1981 年而未说明何月何日, 见朱江 “扬州发现元代基督教徒墓碑”, 载《文物》1986 年第 3 期 68 页.
- [67] N. Sims-Williams, & 牛汝极. 扬州出土突厥语-汉语-叙利亚语合璧究竟教徒墓碑研究 [A]. 《学术集林》第 10 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12: 357 - 379.

- [68] A.C.Moule, *Christian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London 1930, reprinted in Taipei 1972, pp. 86—88 .
- [69] P. Y. Saeki,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Tokyo 1937, pp. 315—333.
- [70] J. Hamilton, *Le Texte Turc en Caracteres Syriaques du Grand Sceau Cruciforme de Mar Yahballaha III*, in: *Journal Asiatique*, 1972, pp.155 ~ 170.
- [71] W. Barthold, "The Bughra Khan mentioned in the Qudatqu Bilik", *BSOAS*, III, 1: 151-8, 1923, 罗斯在其文章中所加的注释说明了这批文书的来源.
- [72] Vladimir Minorsky, "Some Early Documents in Person- I",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2, 181-94.
- Sinasi Tekin, "Bilinen en Esli Islami Türkçe metinler: Uygur Harfleryle Yazılmış Karahanlılar Devrine ait Tarla Satış Senetleri", *Selçuklu Araştırmaları Dergisi*, IV , 1975, 157-86; —— "A Qarahanid Document of A.D. 1121(A.H.515) from Yarkand", in *Eucharisteion: Essays Presented to Omeljan Pritsak*,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III-IV, 1979-80, 2: 868-83).
- Marcel Erdal, "The Turkish Yarkand Documents", *BSOAS*, XLVII, 2, 1984, 260- 301.
- Monika Gronke, "The Arabic Yarkand Documents", *BSOAS*, XLIX, 3, 1986, 454-507.
- [73] A. F. R. Hoernle, "A Report of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 *JASB*, LXX-1, Extra no. 1, 1898, pp. 26-30.
- [74] Cl. Huart, "Trois actes notariés arabes de Yarkend", *Journal Asiatique*, 1914, IV, Xle serie 607-27.
- [75] 参见上引 Sinasi Tekin 和 Macel Erdal 文.
- [76] 参见上引 Macel Erdal 文.
- [77] 李经纬. 莎车出土回鹘文土地买卖文书释译 [J]. 西域研究, 1998. (3): 18 – 28. 李经纬. 吐鲁番与莎车出土回鹘文买卖文书比较研究 [A]. 刘志霄. 《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论丛》第 1 辑 [M].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140 – 165.
- [78] 参见上引 Monika Gronke 文. 另见牛汝极. 莎车喀喇汗朝阿拉伯文书与 ‘福乐智慧学’ 研究 [J]. 西域研究, 1999.3.
- [79] 安瓦尔·巴依图尔. 察合台文和察合台文献 [A].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牛汝极. 法国所藏维吾尔学文献文物及其研究 [J]. 西域研究. 1994. 2. 牛汝极. 瑞典的维吾尔文献资料及维吾尔研究综览 [J]. 新疆文物, 1994.1. 牛汝极. 察合台文及其文献 [A]. 察合台文献提要 [A]. 拙著《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 [M].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143-152, 237-265.

Review and Prospect on Editing and Studying of Uygur Historical Data and Documents in Non- Chinese Language in 20th Century.

NLIURU-ji

(Northwest Ethnic Minorities Research Ceuter,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basic circumstances of editing and studying of Uygur historical data

and documents in non- Chinese language in 20thcentury and shortly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Key words: Uyghur; documents; Turkic; religion

收稿日期: 2003-04-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97－1999）：《巴黎所藏敦煌回鹘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一部分。

文章产出的资助背景: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2.5 万元

作者简介: 牛汝极, (1958 年—), 男, 甘肃天水人, 现为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主要从事西域文献、中亚史及民族语言学研究。